1. Introduction

2.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y

文献综述和假设都取决于结果

2.1 政治信任部分

2.1.1 **把政党带回来：**如果只研究对党的信任，那么文献综述主要强调当前对中国的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政府的信任，如理论上的差序信任（李连江、吕杰等），方法上测试人们的回答是否是真实的，不存在社会期望偏差问题，如列表实验等（唐文芳、张扬等）。但是少有人关注对党的信任，以及对党信任程度随着时间和时代如何变化。鉴于中国共产党居于中国政治体制的主导地位，忽视了对党信任的研究是不利于解释当代中国的许多变化和政策的（比较政治学：芭芭拉对于政权体制的分类、黎安友/景跃进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强调）。

2.1.2 **同床异梦：**如果只研究后面3波的数据，那么可以聚焦于对党和对政府的信任。首先，看看各自是怎么回事；其次，比较党/政府信任的不同时期和世代趋势，最好是找到某一时期/世代对党/政府信任程度高，但同时对政府/党的信任程度低，这个就比较有意思。那么文献综述则从对政府信任和对党信任两方面来阐述，不过少有研究对二者进行比较。因此，本文的贡献在于比较了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不同维度，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不是一回事。当前，许多调查表明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十分高，那么本研究强调虽然民众对于政府和党的信任都比较高（绝对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对比），但是**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同的时期和世代是不是有点大（相对）**。

2.2 民主部分

2.2.1 功利性民主和绩效性民主：如果两种观念性民主在不同时期和世代有所区别，那么可以讲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改革开放导致西方自由民主观念深入中国，因此80年代的绩效性民主观念比较强 vs 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和福利政策，导致80年代的功利性民主观念较强？（反正这个可讲的蛮多）。如果确实有区别，那么文献综述主要从学界关于民主观念的区分（吕杰）、中国威权韧性/或者民众认为中国是民主国家的原因（胡安林茨）等，**但即使是对民主观念进行区分，也没有人提出功利性和绩效性民主（刘瑜提出）。同时，我们需要比较比例变化，也就是说一个人其实同时拥有绩效性民主和功利性民主两种观念，但是这两种观念占的比例是不一样，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看看不同比例在时期和世代发生的变化（无论是这两种民主观念的提出，还是比例的变化，都是原创性的）**

**CBS中关于绩效和功利民主观念只有2011/2014/2019三波，所以是不是也需要合并不同数据？ 但关于强硬领导人的问题每一波都有，这也可以进行探索一些探索，比如对强硬领导人的需要存在时代和世代差异，why。**

2.2.2. 民主程度和民主重要性：这两个问题可以一起研究，也就说看看中国民众认为中国民主程度的时期和世代趋势以及民主是不是越来越重要。当前研究表明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都认为民主越来越重要，因此总是宣传自己是民主国家。但是是不是忽视了年龄和世代效应，比如改革开放一代是不是比文革一代更加认为民主很重要，但是却认为中国的民主程度降低了？所以本文对民主研究的贡献在于考虑了世代和年龄效应。

2.2.3 中国民主程度 vs 美国民主程度：这个可以做个比较分析，因为CBS的数据每一波都问到了这两个国家，如果发现中国民众对中美两国民主程度存在时期和世代的区别，那么倒可以写一篇外交/比较分析**（中文期刊——直接对标世经政）**

2.3 民族主义部分

2.3.1 民族主义 vs 爱国主义：现有研究通常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混为一谈，但二者实际上是有区别，爱国主义或许一直存在，但是民族主义却是被塑造的，是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史密斯、盖尔纳，这三者分别提出了建构主义/血缘/功能性的民族主义起源，唐文芳有详细阐述）。如果数据发现爱国主义一直是不变的，但是民族主义却在不同时期和世代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先可以证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两码事，其次可以探索为什么民族主义会有高有低，是不是国家政策塑造？或者是外国宣传？这个时候倒是可以探索因果关系了。关键问题在于，cbs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不是每一波都一样，虽然有共同的问题，但只有一个，这样的话单独一个问题来说明民族主义，显得有点乏力，爱国主义也不是每一波都有(爱国主义wvs2-7波都有，已经编码)。如果要做这个，可以问问看能不能做不同数据来源的，然后合并（CGSS、CBS）

2.3.2 民族主义和对党的信任：CBS有关于对党的信任，那么民族主义和对党的信任可以作为交互或者原因，民族主义程度越深的世代对党的信任越高。或者比较，将民族主义直接混淆为爱国主义，虽然我爱国但是我不信任党，这表明民众对党和国家有着明确的区分，而是不是党国一体。也可以将民族主义的测量变量说成是制度信任，这个时候就回到了弥散信任和机构信任（戴维伊斯顿）的经典命题，信任政党只能说明是具体的机构信任，信任政治制度才会有更大的耐心和国家稳定，那么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即使党垮了，民众也不会推翻现有政治制度。或者民众对于党的信任远大于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因此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会持久存在。（wvs也可以做了）

3. Method and Variable

3.1 Dependence variable

以下因变量都需要做三种处理：连续变量、二分变量（这里需要试：也就是说到底是大于均值、还是最大的那一个或者两个为1，需要看哪个符合预期）

**政治信任**

3.1.1 对党的信任（连续变量和二元变量都需要做一下，如果结果不太理想，标准化也可以做）CBS有一波没有（明天看看）

3.1.2 对政府的信任（处理同上，不过**只有3波的数据（4-7波））**

**CBS每一波都有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数据，这样的话可以把民族主义加进来，看看民族主义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民主**

3.2.1 民主观念（功利性民主和绩效性民主）

做民主的话，功利性和绩效性可以选择不同的问题，看哪些问题的选择支持有利就选哪个，目前是对各自的问题加总求平均得到，到时候可以做个factor analysis或者IRT

3.2.2 民主重要性

3.2.3 中国的民主程度

3.2 Method：Age-Cohort-Period

4. Research and Results

4.1 Main Findings

（1）年龄（连续变量和分组变量）

年龄变量：这个好做  
分组变量：多少岁到多少岁划分为一组（先看其他人一般怎么划分，如果我们的结论不支持的话，那么再根据我们自己的来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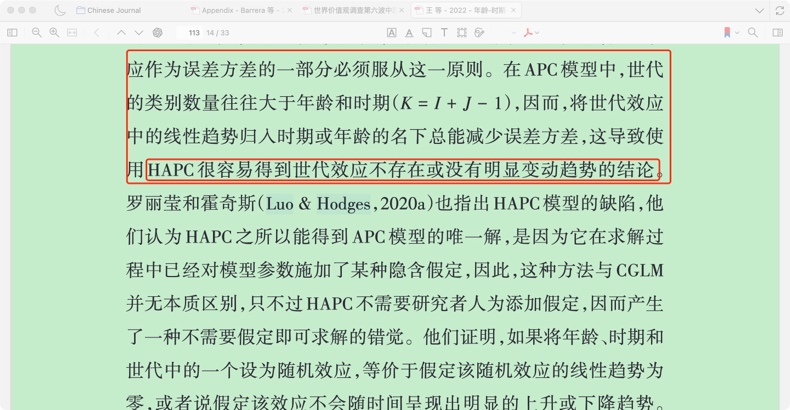
（2）时期：时期效应很显著，这个没啥好说的

**但目前我自己做统计回归遇到的困惑：对党信任的数据包括2-7波（1995-2018），但是在看每个年份的系数或者画图的时候1995是不出现的，很奇怪。**

**对政府的信任1-2（1990/1995）不出现的是因为在中国没有数据，压根没问这个问题。**

**所以目前主打对党的信任，如果只做三波的话，对政府的信任也可以。**

**（3）世代：世代效应不显著，每一个时代（10年划分还是5年划分）都不显著。我想可能是HAPC本身的原因导致的。这个是否有处理的办法还是说可以这样，就看个趋势即可。**

****

4.2 Robust Check

4.2.1 Alternative Method：

虚拟变量法/固定效应/Dummy meth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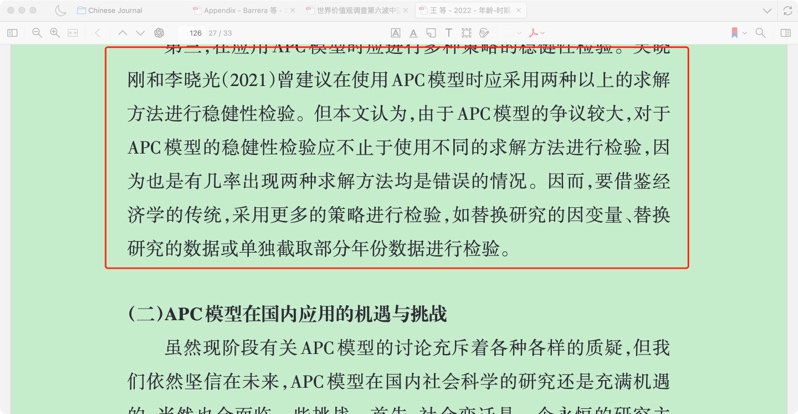
（1）cohort 和 period dummy

（2）age 也变成dummy

改变数据收集：CBS data

改变因变量：政府信任（ols 和二分） 民主观念（换一些问题描述）

改变时段：如果研究对党的信任，目前有2-7波的数据，政府信任只有4-7波的数据，因此对党的信任可以截取4-7波看看结果



5.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To Do List：**

**ZW：对WVS的数据进行APC分析 + 对CBS的数据进行APC分析**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1. 民主的大范围**

文化是人们解读现实的镜头。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民主概念对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和民主崩溃都具有重大影响。然而，民主概念本身却蕴含着巨大的诠释弹性。从古至今，学者们对民主概念赋予了不同的含义。XX从民主的规范含义出发，提出民主就是大多数人统治，

民主意味着具有一个边界清晰且道德先天优势的人民实体，人民的意志是公共决策的绝对基础；熊彼特强调从民主的程序性含义进行解释，指出民主的真谛在于组织一场开放与竞争性选举，民主的质量取决于选举程序的透明性与开放性。熊彼特对竞争性民主和古典民主的区分为现代政治学民主概念的争论奠定了基础。达尔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多元政体概念，试图取代民主政体概念。他认为，现实中的民主既不同于人民当家做主的直接民主，前者将民主与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联系起来，其特征是多个少数统治(rule by minorities)，后者则与实现共同利益联系起来。达尔以及其他学者对极简主义民主概念的辩护（Popper，2020；Przeworski，1999；Schmitter &amp; Karl，1991），都表明经过上百年的激烈辩论后，民主的定义在学者之间基本达成了共识。

然而，学者间的默契并不意味着公众的认同，不同国家的民众对民主概念的理解大相径庭，甚至持有互相矛盾的观念。对许多人来说，民主不仅意味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还意味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公共服务的提升、腐败的遏制、贫困的消除等，换句话说，民主意味着各种形式的效用和好的东西。Dalton、Shin 和 Jou（2007）根据人们对民主的自我定义，将他们的答案分为制度民主、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并发现虽然自由民主得到广泛认可，但威权国家的人们对社会民主的认可度远大于民主国家。Zagrebina (2020) 发现，民主国家的人倾向于以更“隐形”的方式解读民主，而非民主国家的人则通过更“可见”的视角来看待民主。

上述两种概念理解的差异对于人们如何评价政府性质具有重要意义。自由民主话语中，由于其明确强调制度和程序，政权的民主性质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竞争性选举、政府决策是否按照既定程序进行、人民的权利是否得到制度化保障。相反，功利性民主忽视和淡化制度/程序，强调民主带来的好处，特别是政府的政策是否能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并长期促进公共利益。因此，民主概念本身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

然而，当前学界对功利性和程序性民主观念的实证研究主要利用横截面数据，分析两种民主观念对人们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如Canache (2012) 分析了不同民主观念对民主重要性和民主满意度的影响，发现程序性民主观念增加了民众对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的支持。通过对程序性民主和工具性民主偏好差异的分析，Scott 和 Pérez - Liñán (2013)发现，民众对工具性民主的偏爱是拉美国家民主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史天健则利用第二波亚洲晴雨表的数据,发现中国人的民主观主要是监护式民主，而非自由式民主，因而在中国人眼中，中国政治体系已经实现了高度民主。尽管上述研究为我们发现民主观念的政治后果提供了宝贵证据，但大众民主观念并不是一尘不变的，民主观念具有时间维度，不同年龄、不同时期和不同世代下的民主观念可能不一样。相比于1970年代出生的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民众持有的民主观念可能更加偏向程序性。因此，得益于长时期调查数据的发展，本文强调将时间和世代分析带回民主观念的研究中，探索两种民主观念变化的时间变化和世代异质性。

本文由两个目的。首先，我们利用亚洲晴雨表2011-2019年的数据，运用APC模型来揭露中国民众两种民主观念（程序性民主 vs 功利性民主）在年龄、世代和时期上的差异；其次，本文试图分析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和后果，特别关注互联网的普及和教育体系的灌输，如何影响人们的民主观念及其对中国政府的信任。

如**吕杰系统地比较了监护式民主和西式自由民主，发现尽管民众一致认可民主治理的合法性及其理想结果。然而，当问及民主是什么时，中国民众将**

**如何实践民主治理（即实现这些理想目标的具体制度设置）时，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路线。**

Culture is the lens through which people interpret reality. As a core element of political culture,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democratic collapse. However,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itself has not only caused great controversy among ordinary people, but even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definition of democracy. Schumpeter's distinction between competitive and classical democracy set the stage for the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 debate over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The former associates democracy with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while the latter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mmon good.

却引起了巨大争议，不仅仅在普通民众心中

民主本身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议的概念

但对于世界各国的人民来说，民主的概念并不是不证自明的。

然而，对于政治理论家来说，民主的意义仍然激发着根本性的争论，正如协商民主文献所表明的那样。

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民主

Democracy is an oft-debated concept. Peopl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ttach various meanings to this word (Canache, 2012; Dalton et al., 2007; Mattes and Bratton, 2007). Even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this ‘fuzzy-democracy syndrome’ affects average citizens as well as political elites (Crow, 2010; Miller et al., 1997).

民主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议的概念。不同国家的人们对这个词赋予了不同的含义（Canache，2012 年；Dalton 等人，2007 年；Mattes 和 Bratton，2007 年）。即使在同一个国家，这种 "模糊民主综合症 "也会影响到普通公民和政治精英（Crow, 2**010; Miller et al.）**

个人对民主的理解决定了他们对民主的需求和满意度（Crow，2010；Mattes 和 Bratton，2007），以及他们对参与性活动的态度（Canache，2012）。

**2. 当前研究：理论上/方法上**

**2.1 中国民众认为中国民主程度十分高，学者们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XX；最主要的还是吕杰将中国民众的民主观念分为儒家和程序性，发现中国人持有的民主观念与西方不同，因此中国人才认为民主程度很高。但是，最直接而言，尤其是新冠之后，认为对民主的看法只要是经济和程序，并且****尚未存在长时段研究，有谁利用XX的数据，但也只是横截面的。**

**Systematic comparison between the guardianship discourse and the liberal democracy discourse**

**吕杰系统比较了监护式民主和西式自由民主，发现尽管民众一致认可民主治理的合法性及其理想结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提供稳定的环境，为整个社会带来更多的（即使不是最大化的）集体利益。然而，当谈到应该如何实践民主治理（即实现这些理想目标的具体制度设置）时，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路线。**

**提出了监护式民主，监护人治理模式吸引了世界各地众多政治思想家，并被专制领导人长期系统地实践（儒家思想和列宁主义都是监护人治理模式的经典例子）**

**3. 本文目的：基于此，本文旨在研究不同民主观念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wofold. First, we propos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amine popular democratic conceptions in societies with limited experiences of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following this framework, we use new survey instruments to investigat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popular democratic conceptions in mainland China,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doctrinates its people with a guardianship discourse on democracy to disguise its authoritarian nature. Using national survey data,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ffectively taken advantage of its regulated education and media systems, as well as its lingering Confucian and Leninist traditions, to promote and indoctrinate its people with the guardianship discourse. A majority of Chinese citizens indeed understand democracy following this particular discourse and, thus, perce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more or less a democracy.

本文有两个目的。首先，我们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民众所持有的功利性和绩效性民主观念。其次，根据这一框架，我们使用APC

本文有两个目的。首先，我们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研究民主政治经验有限的社会中的大众民主观念。其次，根据这一框架，我们使用新的调查工具来研究中国大陆民众民主观念的起源和后果，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如何向其人民灌输关于民主的监护话语，以掩盖其专制本质。本文利用全国调查数据证明，中国政府有效地利用了其规范的教育和媒体系统，以及残余的儒家和列宁主义传统，向人民宣传和灌输监护话语。大多数中国公民确实是按照这种特定的话语来理解民主的，因此，他们或多或少地认为中国政府是民主的。

Literature Review：

Thus,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consolidation, contemporary research should look beyond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and study the political competition over the ideas and discourses that shape citizens’ attitudes about concepts like democracy.

正如 Diamond（2006）所言，民主过渡的一个关键阶段是公民学习民主理念和批判非民主做法。因此，要全面理解民主过渡和巩固，当代研究应超越制度和结构因素，研究形成公民对民主等概念的态度的思想和话语的政治竞争。

In his relevant research on Mexico, Crow (2010: 48) explicitly argues that ‘Concepts of democracy are a question of emphasis’

在对墨西哥的相关研究中，Crow（2010：48）明确指出，"民主的概念是一个重点问题"。

We argue that in these societies, democratic conceptions are no longer a question of emphasis, but are instead reflections of fierce contests over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s in practice. For example, Lee Kuan Yew, the then-premier of Singapore, claimed that the ‘western concept’ of democracy did not work in Asia (Zakaria, 1994). From Mao Zedong to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 generations of Chinese leaders have urg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hinese democracy from ‘western democracy’ (Nathan, 1985).

我们认为，在这些社会中，民主观念不再是一个强调的问题，而是实践中制度设置的激烈较量。例如，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就声称“西方民主观念”在亚洲行不通（Zakaria，1994）。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一代又一代中国领导人都呼吁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有所区别（Nathan，1985）。

Likewise, in Latin American and African democracies, people differ in their democratic conceptions regarding whether more weight should be associated with protec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or sound socioeconomic performance (Canache, 2012; Mattes and Bratton, 2007)

同样，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民主国家，人们的民主观念也不尽相同，他们认为更多的权重应与政治权利的保护相关联，还是与良好的社会经济表现相关联（Canache，2012 年；Mattes，2010 年）。

方法上：

Despite the numerous typologies and measures developed over the past decades, empirical research on popular democratic concep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ver people’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is still rudimentary.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出了许多类型学和测量方法，但有关大众民主观念及其对人们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的实证研究仍然很不成熟。

例如，当一个威权社会的一些公民报告说，他们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民主的最重要特征时，这应该被解释为这样一种信念：要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除了制度化的政治竞争和权利保护之外，还应该确保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是应该被解释为这样一种信念：任何能够持续实现经济增长的政权都是民主的？显然，威权领导人会热衷于向公民灌输后一种理解，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民主外表，以及一种有效的话语武器，以对抗可能出现的民主转型压力

西式自由民主：The liberal democracy discourse accentuates the use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reach collective decisions on public issues and ensure good governance. At the heart of these arrangements lie competitive elections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ised protec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The system not only allows people to press political leaders over policy concerns, but also grants them the right to replace the government through established procedures. In essence, within this discourse, democracy is presented at the very least as a government organised on the basis of a set of institutions that guarantee some basic freedoms and ensure people’s rights to participate, choose their leaders, and collectively make decisions for their society.

自由民主话语强调利用制度安排就公共问题达成集体决策并确保良好治理。这些安排的核心是竞争性选举以及制度化的政治权利保护。该制度不仅允许人们就政策问题向政治领导人施压，还赋予他们通过既定程序更换政府的权利。从本质上讲，在这种话语中，民主至少被描述为一个政府，它建立在一系列制度的基础上，这些制度保证了一些基本自由，并确保人们参与、选择领导人和集体为社会做出决策的权利。

The aforemention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discourse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how people assess the nature of their government. Within the liberal democracy discourse, given its unambiguous emphasis on institutions and procedures, the democratic nature of a regime can be primarily determined by whether there are competitive elections, whether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s are made according to established procedures, as well as whether people’s rights are ensured with institutionalised protec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guardianship discourse’s intentional downplaying of institutions/procedures and emphasis on having virtuous and competent political leaders means that the democratic nature of a regime is essentially assessed by the substanc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especially whether these policies can bring tangible benefits to its people and promote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long term. Clearly, if authoritarian leaders can successfully indoctrinate their citizens with the guardianship discourse, they – with some satisfying performance in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 political order, and public security – can deceive some of their people in regards to the regime’s nature. Furthermore, once misled, the people’s response to opposition forces’ mobilisation for political changes may be depressed, thereby providing the authoritarian leaders with a shield against potential pressure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上述两种话语的差异对于人们如何评价政府性质具有重要意义。自由民主话语中，由于其明确强调制度和程序，政权的民主性质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竞争性选举、政府决策是否按照既定程序进行、人民的权利是否得到制度化保障。相反，监护话语刻意淡化制度/程序，强调有德能干的政治领导人，这意味着政权的民主性质主要取决于政府政策的实质，特别是这些政策是否能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并长期促进公共利益。显然，如果威权领导人能够成功地用监护话语灌输公民，他们——在维持经济增长、政治秩序和公共安全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满意的表现——就政权的性质欺骗了部分人民。此外，一旦被误导，人民对于反对派政治变革动员的反应可能会受到抑制，从而为独裁领导人提供抵御潜在民主转型压力的盾牌。

procedural versus substantive democracy (Bratton et al., 2005; Shin, 2011),

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Bratton 等，2005；Shin，2011）

prioritise socioeconomic welfare rights over political rights (Munro, 2000; Nathan, 1985; Perry, 2008). 优先考虑社会经济福利权利而不是政治权利（Munro，2000；Nathan，1985；Perry，2008）

中国大陆是比较民意研究中一个令人费解的异类。西方学者的调查结果一致表明，大多数中国公民对民主的热情和对中共政权的高度信任同时存在（唐，2005）。一种解释可能是中国人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感受。然而，严格的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发现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政治警惕性（Manion，2010）。11这留下了另一个更合理的推测：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民主并不一定与自由民主话语相符，而是更接近监护话语。彭（1998）在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关于民主的流行话语后得出结论，所有话语都重视贤能政治，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未经民众同意的仁政。这些特点显然与本文考察的监护话语相呼应。

吕杰的文章用了cbs2008的数据，他们衡量了监护式民主与绩效性民主之间的相关性（即在定义民主时，社会经济表现与政治权利的相对重要性），这种相关性很弱。这种弱关系表明，我们的新指标所捕捉到的监护话语之后的民主观念并不等同于更重视社会经济表现的民主观念。因此，我们的新指标似乎捕捉到了中国大陆这一民主政治经验有限的社会中流行的民主观念的一些关键特征。

刘老师：

We argue that popular concepts of democracy, as an element of political culture, significantly affect prospects for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价值观对人们的政治行动很重要。文化是人们解读现实的镜头。

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要素，民主概念对民主巩固和民主转型的前景有重大影响。但对于世界各国的人民来说，民主的概念并不是不证自明的。

然而，对于政治理论家来说，民主的意义仍然激发着根本性的争论，正如协商民主文献所表明的那样。

Based on peoples’ self-definition of democracy, Dalton, Shin, and Jou (2007) categorizes their answers into institutional, liberal and social democracies and finds that, although liberal democracy is widely recognized, people in more democratic countries recognize it more. Norris (2011) had a similar finding based on the WVS data.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manner, Welzel (2014) group notions of democracy into four types: liberal, social, populist and authoritarian

根据人们对民主的自我定义，Dalton、Shin 和 Jou（2007）将他们的答案分为制度民主、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并发现，尽管自由民主得到广泛认可，但民主程度更高的国家人民对它的认可程度更高。Norris（2011）根据 WVS 数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Welzel（2014）以略有不同的方式将民主概念分为四类：自由民主、社会民主、民粹民主和威权民主

卢和石（2014）将“守护者”民主概念与自由民主概念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儒家传统。卡纳什（2012）认为，拉丁美洲也存在不同的民主概念，有些更自由，有些则更实质性。扎格勒比纳（2020）发现，民主国家的人倾向于以一种更“隐形”的方式来解读民主，而非民主国家的人则通过更“可见”的视角来看待民主。

对全球许多人来说，民主不仅意味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还意味着经济发展、社会平等、福利提供、宗教偏袒、民族自豪感、低犯罪率等——换句话说，各种形式的效用。政治文化学家意识到了这种区别的重要性，并试图在全球民意调查中发现这种差异。

“程序性民主观念”是指强调制度公正性，如自由公正的选举、权力制衡、尊重公民权利等，是民主的本质特征。“功利性民主观念”是指强调治理结果，如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将特定宗教纳入法律等，是民主的本质组成部分。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并不一定持有程序性或功利性的民主观念。正如许多研究表明的那样，人们大多以混合的方式解读民主。所以当我们谈到以民主观念衡量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指的是这种以不同比例持有的混合观点。还应该澄清的是，这两种民主观念在实践中并不相互排斥。许多拥有强大民主程序的国家也提供了丰富的效用。